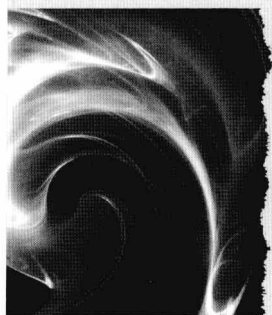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 理论自觉

郑杭生 等◎著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 理论自觉

郑杭生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郑杭生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300-14112-1

I. ①社… II. ①郑…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现代 ②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D668 ②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5444 号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郑杭生 等著

Shehui Zhuanxing yu Zhongguo Shehuixue de Lilun Zijue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电 话 | 010-62511242 (总编室) | | 010-62511398 (质管部) |
| | 010-82501766 (邮购部) | | 010-62514148 (门市部) |
| |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 |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
| 网 址 | http://www.crup.com.cn | | |
| |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 | |
| 规 格 | 170 mm×240 mm 16 开本 |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
| 印 张 | 20.75 插页 1 |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390 000 | 定 价 | 5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代序

两方面的重大收获

——在“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 郑杭生 ·

各位代表：

在这个闭幕式上，此刻大家心想满洲里。敖其教授既有灵活性又有原则性。灵活性体现在她同意改变原有安排，会议结束后即上车去满洲里；原则性体现在我们的闭幕式不能少，要把我们的会议开得**有始有终**。

下面，我就做一个不是总结发言的总结发言。

我们会议的主题是社会转型和理论自觉。我想我们的主要收获也在这两方面。

一、推进了对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各方面的更深入的研究

首先，从总体上明确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问题和主要矛盾是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陆学艺教授经过研究提出，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有15年。这是我们现在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

过去我们论证过，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摩擦的一面，现在看来，相互冲突的一面更加突出了。

其次，从不同领域来看，例如：（1）剖析了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2）研究了中国人是否自私的问题。梁漱溟先生提出，站在西方的观点会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从中国文化、伦理和社会结构来看，这个结论是不对的。这也涉及理论自觉的问题。（3）城市中的就业、收入、老龄化等的形势不容乐观。（4）牧区城市化的新社会问题。（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性。（6）低碳生活的问题等等。由此就给我们的社会建设、社会工作、社会政策提出了新问题。大家探讨了社会工作的新思路、社会政策的新观点。

二、推进了对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更深入的思考

就对别人的反思来看，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整个话语气氛变了，能够用平等的借鉴的观点来看了。不把自己看矮了，不把人家神化了，也不把人家看得是天然地对的了。这种改变是好的，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就对自己的自知之明来看，对自己的学术的自信心提高了，自知之明度提高了。自觉到我们自己有好东西。

我要补充的是，费老的 16 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文明观。这是处理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与西方文化文明，其中包括中西社会学理论关系的准则。我强调了必须有自己的可美的东西。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还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我们对外国的文化文明、社会学理论都要避免两个极端。我体会在中国走极端，无论哪个极端，其结果都是不好的。

这次会议在这两方面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会议取得了应取得的成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将对中国社会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编 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 郑杭生 / 1

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董翔薇 董驹翔 / 4

促进社会学传统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融合聚汇

——个体安全研究假设及方法中的“多棱透镜原则” 杨 敏 / 16

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

——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 王道勇 / 36

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 刘少杰 / 51

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田毅鹏 / 61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方法论自觉

——兼论人文区域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 宋跃飞 / 68

关系社会学研究反思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奂平清 / 74

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分析 时立荣 / 81

第二编 发展模式转变与中国经验

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

——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 郭星华 / 93

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特点及趋势 向德平 / 112

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洪大用 / 124

走向环境友好型发展的博弈规则

——环渤海环境治理机制的个案分析 王书明 崔 璐 / 137

结构优化与体系变革：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的路径选择 李 璐 / 150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论析 杨发祥 闵 慧 / 159

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陆益龙 / 171

从“家长制”到“逆家长制”

——意识形态转型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 王建民 / 183

法治、社会动员与中国现代化 冯仕政 / 190

乡土场域中的信任逻辑与合作理性：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 黄家亮 / 197

第三编 转型中的问题及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 吴忠民 / 215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研究

——基于江苏省扬州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 钟涨宝 李 飞 / 224

需求与寻求：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中的资本和策略

——六省个案研究的扩展 江立华 陈文超 / 240

“社会不确定性”问题初探 赵文龙 / 249

云南跨境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特征研究 张金鹏 乔亨瑞 / 255

城市化过程中农转居人群的角色转换研究 施国庆 王慧娟 / 269

小日志与大事件：互联网的公共话语 陈文江 何祎金 / 281

社会转型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思考 敖 其 / 289

当代蒙古民族游牧文化相关问题之新解读 葛根高娃 / 292

城市蒙古族教育的调查分析

——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为例 温都日娜 / 301

试论走向现代经济社会的中国庙会文化 黄 骏 乔增芳 / 310

社会互构视角下就业秩序变迁的探讨 张笑会 / 317

代后记 / 323

第一编

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

· 郑杭生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会议议程上要我做主题发言，我就借助这个机会，简要地回顾一下，我的理论自觉的历程，并对理论自觉今后的深化，提出几点初步的思考。

我一再强调，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启发，但同时“理论自觉”又有与“文化自觉”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综合“理论自觉”的各个要素，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理论自觉”范畴一经形成和提出，就有这样那样的方法论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既为回顾、又为瞻望、也为观察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度，提供新的概念工具、新的理论视角。

我在《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四卷上、下两册的“自序”中说道：回想起来，应该如实地说，我的“理论自觉”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如果追溯起来，大约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进修时算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的新概念，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个新概念来梳理自己的以至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理论自觉”轨迹上的新起点、新境界，即“理论自觉”的意识更明确、更强烈，实行更主动、更坚实，并进入了对“理论自觉”本身的思考和研究。

总起来说，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一个的轨迹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

在“自序”中，我从九个方面加以论证和说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1.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
2. 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
3. 对与前沿意识相结合的草根精神的提倡
4. 对改革开放 30 年的社会学反思和总结
5. 社会互构论与“理论自觉”的彼此推动
6. 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超越
7. 对一些理论误读的学术剖析
8. 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
9. 学术争鸣、时代精神与“理论自觉”

几乎与此同时，我还专门写了文章，对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和途径做了论述。

目标就是：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

途径主要是四条：

1. 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2. 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
3. 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
4. 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这是我 2009 年 7 月 20 日在中国社会学会 2009 年西安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中强调的。后来这个报告的全文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摘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经过上面的梳理，我们的“理论自觉”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关于“理论自觉”今后的深化，我想简要地提出几点初步的思考。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还要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即它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也是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备前提。

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必由

之路，是指“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处在边陲但是不甘边陲的动力。如果处在边陲、自甘边陲，那就失去了任何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可能。

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指“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觉悟到，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概括、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话语，从而打破、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如果连这种想法都没有，如何谈得上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

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备前提，是指“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界也同样担负着理论创新的责任，同样有可能是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外国理论的贩卖者或掮客。

上述三个必由之路、必要条件、必备前提，充分说明“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的增强，外国社会学者已经对我国社会学界刮目相看，过去那些很难见到、很难请到的外国大牌学者，现在已经相对来说容易见到、容易请到了，这是因为他们现在也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深入研究中国，他们的心态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不提高主体性、反思性，不拿出真正有水平的东西来，最终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

其次，我们还要认识到，“理论自觉”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的转向、实现本理论的创新、实现分理论的开拓。

在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回归或转向上，我想向大家推荐王道勇博士提供给这次会议的文章——《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这篇文章指出：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在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郑杭生通过论证社会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社会学元问题进行全面探究，以及对社会学发展进程进行社会学研究，对社会学元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积极回应，为社会学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再次，我们要进一步认识，“理论自觉”还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促进核心团队的凝聚，推进学派氛围的形成。

我一贯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

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在我看来，都不是适当的。

我也一向主张中国学术界“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总之，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直接相关，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社会运行学派： 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 董翔薇 董驹翔 ·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编辑部，齐齐哈尔大学哲学法学院)

从世界学术发展看，学派意识、学派建设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学术进展的标志。中国学术界少有学派，学派意识也薄弱。郑杭生教授 2003 年 12 月 19 日受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之邀，在学院成立十周年庆典上不长的致词中，很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发展，必须有相互友好竞争的学派”。并希望清华大学能够产生自己的清华社会学学派。^[1]郑杭生教授在 2004 年出版他的三卷本《社会学学术历程》时，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对形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运行学派’或‘协调发展学派’有推动作用，有所促进”。^[2]现在在过去了六七年之后，我们稍微检视就完全有根据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已经形成，它具备了作为学派的必备条件。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历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以郑杭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术群体的理论自觉。

一、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到“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

郑杭生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社会学探索中,最有特点并且也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建树就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3]说这个观点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使我们能客观地评价西方社会学,也关系到我们如何借鉴西方社会学。两种形态说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能清醒地看待和解决所面对的不同性质的问题。郑杭生教授早在 1987 年出版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他为之努力的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在当代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善于坚持,而善于坚持,首要的又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本”去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原本”中本来就有但又因种种原因未被彰显的原理。郑杭生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阐释,在这方面富有启发性。这里还应注意它的潜在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特殊意义。自郑杭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设计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的定义,发展到近年来倡导“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概念,他把社会运行学派社会学推进到了更臻于完善的程度。此处我主要指社会运行论社会学对当代中国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与面对的同样巨大的困难的解释和采取的态度,都达到了极致。解释得符合实际,合理入理。态度是面对困难和问题不悲观,对未来坚定乐观。郑杭生教授这样描述处于新的转折时期的当代中国:“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和它具有的两种力量,体验到社会矛盾多发期、活跃期的必然,体验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必须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正负两面,正确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地参与社会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从而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中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进步,并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4]此处提出来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第一,是郑杭生教授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理论的新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革命批判的。那么到了现阶段,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新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极其巨大辉煌成就的中国,一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同时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社会代价必然伴生着消极面、困境和新的社会矛盾,

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多发期，社会结构也最不稳定，这是不能忽视的。此外，实施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也带来诸多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自觉地积极面对，中国社会学除了大力发展其正向的维护建设作用之外，还必须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这种“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应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功能的自然衍生，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在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 30 余年以后，把这种精神明确出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加以发扬，对中国社会学的自身建设具有特殊意义，甚至有紧迫性。第二，是对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解释学意义上的丰富和发展。“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隐含条件。如果说我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走向改革开放时，尚不可能自觉形成“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那么 30 余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触及更深更广的社会层面，必然要引发出诸多尖锐的消极的或负面的事物，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积极面对，因此也就要自觉地诉求于“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它提醒我们，社会学要有积极的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实际，肯定该肯定的成就，同时也大胆明确地否定该否定的东西。正确的、有根据的否定，其结果不是消极的，它必然会伴生着新的积极的肯定。这样做会使社会学更好地发挥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维护建设作用。郑杭生教授说，“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5]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哲学观点，它包含着丰富的、可讨论和解读的内容。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郑杭生开始全面深入思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从社会运行着眼，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学说，这成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的理论起点。这里已经表现出他的关于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因为他没有只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来框划自己的社会学设想，更没有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来铺陈自己的社会学之路。但是仅仅选好起点还远远不够，好的正确的起点不一定能保证未来之路能走得好。我们幸运地看到，郑杭生教授随之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和整个社会学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思考，而且时至今日在 30 多年中他及他的学术群体从未停止这种思考。他们不断地实践着“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进一步提出问题”^[6]的学术主张，虽然在“解决问题”方面社会运行学派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这一学派仍在不断地“提出问题”。这已经成为社会运行学派推进学术进步的一种形式。

二、“社会互构论”表现出的理论自觉

社会运行学派创造性地使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使我联想到 C·赖斯·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他说：“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相当程度上体现

为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整个社会及组成部分的充分认识。”重要的还有紧接着的另一句话：“正是这种想象力使得社会科学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专家。”^[7]他还强调“社会学家需要进行系统思考”^[8]。在这些方面社会运行学派都是可圈可点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想象力或者说理论自觉，正是走出西方各派经典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创造出“社会运行”这个完全新型的独特的社会学学术术语，并由此发挥出空前的学术“想象力”。恩格斯在1886年的《资本论》英文版的“序言”中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9]我们在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中既看到了“新见解”，也看到了“术语的革命”。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新术语都是“术语的革命”，更不能认为每一个新术语都伴随着一种新见解。对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良性运行”、“社会协调发展”等这类学派术语的检验，判断它们是不是与新见解伴生的“术语的革命”，可能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看它们有无学术衍生力，有无学术支撑力，即看它们对本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其二是看它们是否被理解被接受，特别是在实践中产生实际影响，如“社会协调发展”从学术语言逐渐成为大众性语言，而到现在又正式成为政策性语言。^[10]在这一方面，郑杭生教授也有非常清晰的表达：“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权，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这是理论自觉的实质性内容。”^[11]他认为，中国社会学正是需要多一些如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这样的创新的属于自己的学术概念。我们在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中看到，作为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自觉，它有探索，有学术批评，更有理论创新，这也决定了它作为学科的社会学的学派创新。成为社会运行学派，同时也必然伴生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术语的革命”。这样就有了如“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社会转型的“转型势”、“转型度”和“转型效应”，以及“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这样一些概念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应用。在“术语的革命”上，在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转移研究视角的能力上，社会运行学派表现出明显的理论自觉。在这方面，“社会互构论”可以被认为是社会运行学派的重要学术进展，它应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标志性理念之一”^[12]。在2003年正式提出的“社会互构论”^[13]从两个方面表现出理论自觉：其一是对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和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其二是对“新型现代化的感悟”。“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中被认定为“对我国社会学理论建构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的意义”。

费孝通先生晚年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问题有重要思考，提出了“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理念。他指出，社会学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它的科学性使它有“工具性”，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

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就是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14]。费孝通先生满含深刻人文意蕴的话提示我们，社会学要有深层的学理追求和建设，也是对社会学创新的期待。他如下的话也说得明白而深刻：“‘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样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15]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论述，正与他晚年多次反复提及的“文化自觉”一脉相承。以这样的视角审视，社会运行学派也同样与之一脉相承，它把“文化自觉”更发展为理论自觉。是否可以这样说，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中已经蕴涵着“人”和与人相关的因素。^[16]在自20世纪90年代往后的发展中，它则更加自觉和全面地研究这些因素，更增强了人文意识。社会运行学派中的这种意识也是它更加理性的表现，是超越工具主义的表现——工具主义一定会限制学科的人文意义和学术价值。

社会运行学派是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诞生的。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敏感，特别是对这个转型的理性思考，促进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其中社会学尤为突出。事实上，从世界范围看，社会学和其他一些现代社会科学，都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的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17]社会运行学派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理论自觉，它不断探索，理论不停滞，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学术成就，在持续的社会进展中以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为仍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实际服务。“社会互构论”自建立以来，就引起学界理论上的关注，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诸多问题的分析。“这说明它作为一种理论视野是有较强启发性的，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是有较强切入力的，作为一种有自己显著特色的社会理论是有较强理解力的。”^[18]

三、社会运行学派的自身完善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C·赖斯·米尔斯在1959年说到社会学时，认为有三个总体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每一个方向都易遭扭曲，甚至走火入魔”。第一种是“倾向于一种历史理论”，这是一种很容易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的理论。第二种是“倾向于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过于静态和抽象”的理论。第三种是“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米尔斯认为这种理论很容易成为对互不相关也不太重要的事实的罗列。现

在我们纵观米尔斯之后半个世纪社会学的发展，并比照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米尔斯对社会学的这种评论不无根据并有一定的远见。特别是他由此引申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学的独特性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这几种传统趋势的偏离。但它的前景也许仍要通过这些趋势来理解。”^[19]事实上，米尔斯所指社会学的这三种发展倾向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他的一个合理思想是认为三者各自独立地看，各自独立地发展下去，都会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他进一步认为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应是对这三种倾向的超越，但又不是完全脱离它们去另起炉灶。可见，这三种情况也是社会学发展的有价值的思想来源和基础，但又远远不够。我们看到，社会运行学派理论对这些倾向超越了，走出了自己的路。费孝通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称得上真正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还刚刚开创，要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20]社会运行学派应是费先生所期盼的“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历程中的硕果。

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步开始，就自觉地从两个方面进行学术建设：一个是中国社会（包括对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的反思）；一个是社会学本身（这使社会运行学派有了元社会学学术性）。这正吻合了费孝通先生的主张：“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主题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清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里边，看清楚全人类的文化是怎么变化，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先要定好位，才好往前走。”他还指出，就世界而言，最大的实际是人类社会世纪之交的文化变迁。^[21]就中国而言，最大的实际就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社会快速转型。对此，社会运行学派把握得极其准确，它在其往后的学术探索中，运用“社会运行”这一主导观念，在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社会学本身的交互研究中，使这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1979 年恢复社会学之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渐有社会学的学术视角，对此我们已经看到多么重要，但是也由于社会学在中国中断多年，中断前的社会学大体上是西方社会学体系，这又决定了不能不面对转型的中国社会，去努力建设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在这两个方面，社会运行学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明确的理论自觉，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 年）、《社会运行导论》（1993 年）、《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 年；以后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一版，1994 年；第二版，1998 年；第三版，2003 年）、《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1996 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1996 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1997 年）等著述，以及自 1997 年始至今由郑杭生任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3 年中断一年），特别是还有超过 500 万字的四卷六册《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都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个方面的关

联性：以“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中的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在建设“神州气派”和“本土风格”的中国社会学历程中，时时关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正表现出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的起步处：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设中国社会学，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来研究和服务于中国社会。而这后一点，社会运行学派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立论。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曲折摸索，“文化大革命”中的恶性运行，以及“文化大革命”后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初步实现了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表现为“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22]。这完全是用社会运行论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同时也表达出社会运行学派为社会服务的着力点。为社会服务是社会运行学派一贯的学术主张，“社会学主要地正是通过提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样一种与人有关的社会学角度，为社会实践服务”^[23]。而“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好像一把钥匙，既打开了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之门，又打开了人们正确看待社会生活的思想之窗”^[24]。本人曾经认为郑杭生教授早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既构想了宏观上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对象，也具体地探讨了微观上怎样保证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这也就是说，《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不仅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做了极有启发性的承前启后的新探索，而且引导我们从研究对象着眼去思考社会学怎样为社会服务，去思考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25]由此我们看到，以郑杭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社会运行学派正自觉地实践着“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学术追求。

四、社会学本土化中的理论自觉

20世纪70年代刚刚结束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新时期，如同其他一切领域一样，学术也是百废待兴。这种形势也给中国学术带来难得的机遇。机遇之一是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面对中国化的问题，即在新形势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怎样总结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社会学更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中断的社会学及其学术承担者都是传承西方社会学，从学术范式、学术术语都不能不是西方社会学的，这是难免的。但从中国走出去受西方导师训练的又回来的一些杰出社会学家也认识到，中国不是西方，源于西方的社会学要在中国存在下去就必须本土化。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批自觉把西方社会学中国化的杰出社会学家，孙本